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 文明与国际政治

——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王缉思★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 文明与 国际政治

——由国际学者拜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王缉思★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王 俭

·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

**文明与国际政治**

—— 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王缉思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编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276,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062—0/D·408

定价 19.00 元

#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 编委会名单

**主编：**冯绍雷 陈 昕

**编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李敏焘 陈 昕 黄仁伟

#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

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隔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

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

#### 4 文明与国际政治

---

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间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陈乐民

# 拓宽国际政治 研究的领域

——代序言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在中国似乎愈加成为一门“显学”了。首先是关心的人多了，执笔为文的也多了。国内外的理论动向（尤其是国外的），各方提出的新问题、新视角，都十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每每议论风生，气氛活跃。这表明，热心于国际政治的人已经不满足于对事件的描绘，（哪怕是极细微的描绘），而是把眼光聚集在国际局势和人类社会的走势上。旧的框框既已突破，新的框框（如果可能有的话）会是个什么样子，自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政治力量，乃至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个人，都不能置身物外。为此，或许可以说，国际政治已是大众之学。

国际政治的领域因此而大为拓宽了。过去我们一般比较偏重于从政治层面上看世界上的事情，即政治性质的斗争。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要一提起东方、西方之类的问题来，大多是以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划线”、“站队”标准的。无论东

方、西方概莫能外——在中国，就是要坚持反对帝修反的政治立场。六十年代发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辩论”，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肯定都还记得很清楚。到了七十年代，国际政治的内涵已渐渐地扩大了许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经济在国际政治中的功能和份量，显著地进一步地明显化了，那是因为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推动着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当世人还没有来得及清理自己的思路的时候，一场持续进行的、高一级的产业革命，已经递出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和人类社会的消息。至于那时的中国，则正忙于使自己倒退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许多国家建立邦交并没有因此而使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仍然只是几个“世界”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人类社会的脚步诚然是加快了，不容世人以常规视之。在中国，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更新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习惯。我们国际问题的研究者在几年的时间里，就迅速跟上了世界的潮流；把政治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里，已是运用得相当圆熟了。

近几年，以纪念“地理大发现”五百周年为契机，我国学者在研究领域又拓宽了一大步，把国际问题同世界历史联接起来，超越了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和分析，进入了对人类社会前途的索解。“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即是其反映，它至少从学理上增加了新的研究内涵。人类历史是按照怎样的轨迹运行的？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处在这条轨迹上的什么位置？人们把中外先哲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在崭新的高度上又提出来了。

差不多同时，中国学者读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内容要点见本书朱文莉撰写的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要旨》，亨廷顿的全文载美国《外交》季刊 1993 年，夏季号）。在中国，对亨廷顿文章的反应比前几年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反应要广泛和深入得多。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就是部分中国学者作出的反应。这里姑且不来评论亨文本身，因为集子里的文章多有见仁见智之论；使我觉得新鲜的，是学者们不仅注意到了政治和经济的结合，而且把国际政治同人类的文明史挂起了钩。把国际政治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轨迹上来加以历史的、综合的考察，在西方并不自今日始。我们只是到最近几年，尤其是亨廷顿的文章，才引起我们集中的注意。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已习惯于把“国际政治”同“国际时事”和对具体问题提出实用性方案划了等号。现在讨论的问题，则是把研究更加深入，更具思辨性，并试图站在整个文明的高度去俯视世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在我们是一种理论尝试，开始时似乎有个多少使人觉得“文明”与“国际政治”两张皮的问题；即使是亨廷顿笔下的“文明”，也分明是政治化了的（或意识形态化了的）“文明”。集子里的文章多处提到了这个意思。然而，“文明”既已在“国际政治”中出场了，那就需要把这个持之有故的问题抓住，并深究下去。我们的理论工作该当把它弄得能够自圆其说。

长期以来，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即把国际政治纳入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纳入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在这个大框架里，千变万化的国际政治，无非是其中的戏剧、插曲，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曲折反映，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江大河中激荡起来的浪花。所以，文明（文化）与国际政治到底有什么关系，就需置身于这条长江大河中去观察。我感到，从“文明”到“国际政治”需得有个联结点，而联结“文明”

#### 4 文明与国际政治

与“国际政治”的只能是历史——是文明造就了历史，国际政治则是整体的世界历史的“部件”。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文明，就相应地该有什么样的历史。“文明”好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改造着社会，支撑着国家，牵动着、主宰着人类的历史，也因此影响着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在有些国家的大学里，“国际政治”是放在历史系里的；我国南京大学也是把“国际政治”作为历史系的一个专业。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如此说来，文明的涵盖面不可谓不广矣，其威力亦不可谓不大矣，真所谓无所不包了。巴尔扎克说，社会的各种敌对力量都在彼此抵销，却把“全部权力”留给了“文明”这个取代了国王的“伟大的皇后”——“这个古老的可怕的形象，这个人类在上天和他之间创造的虚假的主宰”<sup>①</sup>！我比较赞赏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基佐的概括，他认为，“文明”之为物盖可解为人类社会发展与精神发展之本原和综合；因此，文明有如“造成一个民族的财富的一片海洋；这个民族生活的一切因素、其赖以生存的全部力量都寓居于这片海洋之中”；历史学家的任务端在于“从每个世纪当中，从每种形态的文明当中，把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即普遍采用的原则——分理出来，因为正是它们给受制于其威力的几代人或则带来福祉，或则造成不幸，甚且影响及于后代人的命运”<sup>②</sup>。

基佐的这些话大约可以分得为三层意思：一，文明是物质的和精神的总和；二，文明是历史过程中的产物，因之文明本身也是一种过程；三，文明是与民族的成长联系在一起。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汤因比延续并进而阐发己意，表述虽异，义理则一。由此可以想见，文明既然不是超时空的普遍人类文明，那么各种文明便都有其内在的天然生成和发展的依

据和规律。征之于华裔美国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的“长期历史合理性”历史观,文明史亦当作如是观。

同时,各种文明还具有不同程度的外扩性质。人类越是深入到文明时代,文明的外扩品格便越加为人所感到。不同的文明在交会中总免不了相互排斥或相互吸引。相互排斥表明文明含有不易改变的个性,相互吸引则表明文明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因此在历史进程中,一成不变的文明是没有的;在一个时期内全然改观的文明也是不可思议的。沿着文明的外扩性去想,则会发现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必定要通向“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从而取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sup>③</sup>。

以上拉杂说来,约可归结为关于文明的一条线索,化为一个世界历史框架内的“公式”,就是:文明——国家(民族)——国际政治——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的走向与前瞻。这条线索与康德提出的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的理性发展是重合的:

……这条线索不仅能够有助于廓清人间事物的如此纷繁混乱的表现,并为未来的种种国家变化提供政治预言的艺术(人类历史之为用早寓于此,尽管每每被视为似乎与之无关的无规律自由的一种结果),而且还会——不假定有一种大自然的计划,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希望这一点——提出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远景:它远距离地展示出人类物种怎样终于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那时候大自然在人间所播下的全部种籽都将能充分地发育成长,而人类的使命也就能够在地球上实现。<sup>④</sup>

显然这条从低到高的线索，绝不是一条直线，人类在它的漫长旅途中，要经历各种文明的相互激荡、冲突和融合。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冲突往往表现为不同地域的人群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势，假“文明”之名以行的冲突。然而，如果排除了那些人为的、外在于文明的种种政治倾向和意图，则“文明”之间，存在着的便该是歧异和类比，而歧异并不见得是迎头相撞的冲突。因此现在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是托言“文明”的政治冲突，或是给政治冲突披上了一件“文明”的外衣，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如此纷繁混乱的表现”。把这些表现“廓清”之后，若单纯从文明自身的固有性格出发，或从其发展史来看，倒是多元文明程度不同的、不同层次上的“共存”、“交流”或“融合”，才更应是人类文明史的大趋势。

或谓，这岂不是提倡“世界文化”么？而从今天的现实看，明明差着十万八千里，岂不是放言空论么？对这类问题不能做非黑即白的回答，也不是人的主观上提倡或不提倡的问题；而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看，普世性的文明成份所占的比重，定将越来越提高，而不是相反。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跨地区、跨民族的普及，市场经济规律和机制的超越国界、区界的流行，对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准则、思维方式等等，都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使地域之间、民族之间、人群之间的距离（差别）逐渐地、但却明显地缩小。

准此，我们必须看到事物的两面：趋势的、进程的一面和现世存在的问题的另一面，不要让其中的一面遮住视线。即如不久前中国学者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李慎之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不要仅仅看到今天的世界上还充满了对抗与争夺、征战与杀戮，事实上，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

的融合已经在开始了。根据现在已有的各种知识推断,人这个物种应该是起于同一个源头的,但是在以后若干万年的过程中却由于求生存而散布到地球上各个角落,一群一群地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化。这种情况大概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已为天下裂’了。但是它却并不就是‘往而不返,必不合矣’。随着交通能力的进步和生存条件的改善,分散的人群又慢慢地会合起来了。到距今整整五百年以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各地的人类总算又互相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但是交往的程度仍然是只能慢慢地增加。一直到五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才可以认真地说,全球化的时代开始了。人员、物资、能量、信息现在是全球范围内交流、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这样的交流必然要带来各个民族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所以,裂了的道术还是要合的。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才是通人之言,见道之论。”<sup>⑤</sup>

这就是说,人类文化作为一种过程,必定要见其分,也见其合。历史已为见证。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源头本不在西方,倒是从东方移过来而与希腊罗马文明相融合、并扎根于西欧的。从文化形态学来看,现在习说的“基督教文明”实是东西文化早期会合而成的。甚至在封闭的西欧中世纪,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小亚细亚文化,仍得以通过意大利南方和地中海南北两岸渗入西欧。阿威洛依主义便是纽带之一。而纯属西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光芒,也照射到了拜占廷的欧亚交界地区和北非。诚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要晚几个世纪,而且经历了不同的路程和表现,然而可以说,相互隔离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不同文明相遇时会因差异而

引出“冲突”，但那“冲突”所产生的效应，同样会包含“融合”的成份。这里的所谓“冲突”指的是差异的延伸；同样，“融合”也是差异的延伸。

这就要求我们通观人类历史的学者，具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眼光。这实在算不得新鲜的道理，从中国的《礼运》到西方的空想共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到今天的“全球化”——从古圣先哲到今天，都是把人类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诚然，思想家的理念包含着矛盾，因为在他们从不同立场向往的世界前景中，人类无法绕过他们在思想里、学说里试图战胜的充斥着分裂、纷争、厮杀、战乱的现实。康德的理性主义世界历史观，已经涵盖了违背理性主义的种种表现；在达到“整合”之前，“解构”是不可免的阶段，这就需要承认整合化在时、空观念上必然表现为“过程”。这是一个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国际政治学相结合的问题。

所以，文明与国际政治似乎有两重意思可说。一是既然文明可以决定一国的发展，由此自会影响该国（通过其执政集团）在对外关系中的思想、政策、举措以及国际政治的样式。二是在“全球化”的远视角下的不同时代的国际政治，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类文明史（冲突和融合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多幕戏剧；无论舞台上进行着怎样的表演，“戏剧”的进行总是越来越接近人类文明的目的地。也许可以说，前者是政治学的命题，后者是哲学和人类学的命题。

于此，仔细玩味一下康德设想的“理想国”，或许是很有意思的：

来自强权方面的暴力行为将会减少，遵守法律将会增多。在政治团体中大概会有更多的美好行为，



更少的诉讼纠纷,更多的信用可靠,等等,部分地是出于荣誉感,部分地是出于更好地理解到自己的利益。这就终于也会扩展到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并朝向世界性社会的实现迈进,而丝毫也不需要增加人类的道德基础;为此,另一种(超自然影响)的创造物是必要的。因为关于人类在其朝着改善的前进中,我们也不应期望过多,以免有理由要遭受政治家们的讥笑,他们常是宁可把人类的希望当作一种狂乱梦想的。<sup>⑥</sup>

在那个时代,康德只能寄望于“大自然的计划”、“超自然影响的创造物”,等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个“超自然的创造物”已经不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不可捉摸的概念了;人类无需再求助于宗教色彩的“超自然”了。我们对古圣先哲们提出的各色“理想国”,似乎亦不应只纯以虚幻无着的乌托邦目之了。因为科技力量信息时代已取代了“超(或“大”)自然”。

一般说来,当涉及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时,主要是讲矛盾、冲突,协商谈判也是以矛盾或冲突为前提的。亨廷顿的文章讲的就是矛盾和冲突。不过他给冲突披了“文明”的衣服,却又根本抛开不同文明的自身内涵,并定为“范式”,其实着眼的还是眼前的现实政治冲突,同人类文明自身的发展(含冲突与融合)看不出什么有机的联属。

但是,正像我开头时说的,对于我们的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来说,意义并不在亨廷顿文章本身和对它的品评,而在于亨廷顿给我们出了个作文的题目,启发我们使国际政治从大厦的一隅走向世界文明史的整个大厦,视野大大地拓宽了。文章人